

#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王晴佳

---

【编者按】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

【关键词】 考据学 近代史学 兰克学派 文明史学 史料学派

---

自民国初年以降,有关考据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到了战后,更由于西方和东亚学者的参与,使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的学问。但从前人研究的重点来看,主要还是侧重其渊源和发生等方面,而对其影响和后续,则仍然注意不多。本文从比较的角度,探讨考据学在东亚的发展和转变,着重探讨中日史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期中考据学的不同,并进而讨论中日近代学术发展的不同轨迹及其原因。

## 一、考据学在中日发展的源流

就考据学的渊源来看,可以追溯到宋代。理学在那时的兴起,虽然吸收了佛教甚至道教的不少元素,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复兴儒家学说为宗旨的。若想复兴古代儒家的传统,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而儒家的经典,自汉代开始,已经不断有人对之加以注释、诠释,以求掌握其真精神。东汉时期,马融(79-166)、郑玄(127-200)等人就在这方面多有钻研。唐代的颜师古(581-645)、孔颖达(574-648)等人,直接继承了他们的学风。但这些经学的研究,只是儒家传统的一个方面。而另一面,则表现在历代儒家如何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因此,以诠释儒家原典为出发点,使儒家精神能融入、指导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是儒家的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

宋代的政治文化,如余英时先生的近作《朱熹的历史世界》显示,给予士大夫前所未有的

参与空间。<sup>1</sup> 为了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士大夫们不断根据自己的需要,引经据典,因此在诠释儒家原典上,也享有较大的空间。他们对佛教、道教学问的吸收,也显然比前人更为大胆。理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等人,都曾出入佛教经典,而他们的老师周敦颐(1017-1073)则对道教的教义十分熟稔。虽然程颢明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此话虽然不差,但其中包含的外来因素,也无法否认。到了朱熹(1130-1200)的时代,这一“自由”诠释的传统更得以发扬光大。朱熹对以前奉为圭臬的五经颇有微言,他以“四书”取代“五经”,可谓儒家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一大胆的作为,在其它文化宗教传统上,十分少见,但却可以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阶段性发展互相比拟。朱熹十分注重将学问与时代精神相连,并以后者作为治学的出发点。这显然是他能在儒家诠释上如此大胆作为的主要原因。

但是,理学如此改造古典儒家,虽然得到明清朝廷的支持而成为正统,但它却无法取消原典,亦不能取代原典。在明代,即使如主张“心学”的王阳明(1472-1528)及其弟子,在他们的讲学中,也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经典。当时更有不少儒家突破了理学的藩篱,“返朴归真”,借助汉代学者的著作,开始全面、仔细的研究、诠释儒家的原典。从林庆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明代考据学不但颇有规模,而且在许多地方为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准备。<sup>2</sup> 如陈第(1541-1617)的古音学研究,就为清初顾炎武(1613-1682)所继承、发扬,成为清代考据学诠释经典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考据学在清代的兴起,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一种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从更新的研究来看,考据学在清代的兴盛,也与乾隆、嘉庆两朝的经济发达、政治稳定颇有关系。”有名的考据家如王鸣盛(1722-1798)、钱大昕(1728-1804)等人虽然考取功名,但却无心仕途,而是愿意回归乡里,专研学术,这与江南一带的富庶亦有关联。<sup>3</sup> 考据学的兴起与清代政治,当然也有关系。前人如梁启超(1873-1929)曾提出清初“文字狱”的盛行,是使得学者埋首穷经的主要原因。这一说法,已受到质疑。但清代学者对满族的统治,是否完全接受,仍然值得考虑。像王鸣盛、钱大昕那样,不愿在朝廷长期任职,而情愿回归故里,专心从事考据,是否有不满满人统治的一面,也值得思考。当然考据家中,也有不少人愿意效力朝廷,如戴震(1724-1777)多次应考,屡败不舍,就是一例。但戴也许只是为了追求功名而已,并不一定表示他对清朝统治的好恶。

如此种种对清代考据学兴盛的解释,足以表明,考据学的发达,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组合的影响。不管考据家的研究是否带有政治倾向,至少在治学上,考据学是对

<sup>1</sup>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台北:允晨,2003)。

<sup>2</sup> 参林庆彰:《明代的考据学》(台北学生书局,1986)。

<sup>3</sup> 见王俊义:《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224页。

<sup>4</sup> 参见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1, 2nd ed.), pp. 167-176.

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体现一种“复元主义”的倾向。<sup>1</sup>这一复元主义的意图，也是考据学得以流传东亚其它国家的主要原因。明代的学术对朝鲜和日本都有不小的影响。而明代学术的多样性也激发了朝鲜、日本学者对儒学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儒学传统的深远和深厚。就理学而言，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日本几乎并驾齐驱，影响无论轩轻。明代学者罗钦顺（1465-1547）等人用“气”来补充、修正程朱对“理”的强调，很快为日本的伊藤仁齐（1627-1705）和朝鲜的李珥（1536-1584）所吸收，而明代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的“古文运动”，也启发了日本的荻生徂徕（1666-1728）。更重要的是，明代的灭亡，对朝鲜、日本的复元主义运动，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学者目睹满人在明亡之后建立“异族”统治，倾向认为儒家文化之正统已经在中原本土消亡，因此在朝鲜一时有“小中华”之谓，认为儒家文化的正统，只有在朝鲜才得以延续、流传。同样的思想情绪，在日本的儒学家中也同样存在。

清代的考据家和日本的古学家在儒家原典面前，确实保持比理学家更多一层的谦恭态度，但在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傲慢。他们想“占据”原典，“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鄙视、斥责后人对儒家的解读。伊藤仁齐就指责宋儒“不奉文礼王教而以心性为学，是名为仲尼之徒而实畔（叛）之也”。这里表现出，正是一种知识上的傲慢，也包括日本儒学家在明亡之后，对清初政治和学术的某种蔑视。

从伊藤仁齐和荻生徂徕的“古学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儒学家寻求日本儒学主体性的明显趋向。这一趋向的形成，也可谓理所当然。因为日本认真接受儒学、特别是理学，大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而明代学术纷纭复杂，自然会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伊藤仁齐和荻生徂徕，希求回归原典，情有可原。他们的努力虽然有人将之与清代考据学相提并论，但在日本儒学的发展史上，其实与王阳明及其弟子对宋代理学的修正相仿。上面已经提到，王阳明虽然宣扬“心性之学”，但其实他对文献考证也十分重视。对于日本德川时代的儒学演变，广濑淡窗曾有这样的评论。他说自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在日本建立儒学传统以来，主要以程朱理学为宗。以后山崎暗齐（1618-1682）、中江藤树（1608-1648）等人斥佛学、明圣道，形成一变。伊藤仁齐、荻生徂徕强调复兴古义、精密训诂，以诗文为主，躬行为次，又成一变。“古学派”的兴盛，导致程朱理学的衰落，“儒者浮华放荡”，引起世人之厌恶，于是又有人提倡回归宋学。而因为宋学仍然有其弊，所以形成折衷派，在宋学派和古学派之间取舍，以至到了18世纪后半叶，十分之七八的儒者，都信奉折衷派。<sup>2</sup>由此可见，如果说在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是对明末陆王心学的批评和“反动”，那么在日本，折衷派的兴起则是对古学派的一种“反动”。

不过，折衷派虽然是日本儒学传统的产物，但其生存发展，则并无法局限在日本的范围之内。折衷派不仅想在宋学和古学之间折衷，更想汉魏传注、宋明疏释并用，也即将马郑的

<sup>1</sup> “复元主义”（restorationist）由 W. Theodore de Bary 提出，见其论文“Some Common Tendencies in Neo-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in Action*, eds., by David Nivison & Arthur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5-49, 34-35.

<sup>2</sup> 见佐藤文四郎《折衷学概括》，《近世日本の儒学》（东京：岩波书店，1939），第674页。

训诂和程朱的义理的旗帜并举。事实上,折衷派也并不要局限在日本而已。折衷派的主要人物片山兼山(1730—1782)尝言“朱子学所阐释的道,已在我大和得以昭明,而在‘旧华胡清’的中国,先王的诗书礼乐,已不再存在,既然在异国他乡,还存在这些诗书礼乐,何不设法取之?岂不美哉、盛哉?倘真能如此,余死亦可也。”<sup>1</sup>

但是,明清的交替,朱舜水(1600—1682)等之赴日,根据中山久四郎的观察,也使得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交流更为直接。当然,在考据学输入日本以前,日本儒者已经有不少以“考”命名的书籍,因此日本也像中国一样,考据学自有其长久的渊源。如日本儒学发展第二期的代表人物山崎暗齐,就曾有《经名考》、《四书序考》等作品。到了第三期,也即折衷派盛行的时期,考据的风气更为浓厚,于是对清代的考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与片山兼山同为折衷派主要代表的井上金峨(1732—1784),就受到清代儒学的影响,他的门人如吉田篁墩(?—1798)、大田锦城(1765—1825)更成为考据学在日本流行的主要推动者。井上金峨的墓碑铭,有这样的盖棺定论,说他“大抵取舍训诂于汉注唐疏,折衷大义于朱王伊物之间,而其所持论,阐发孔周之道,匡前修之不逮者”。<sup>2</sup>到了吉田篁墩,在清代学问的兴趣,就直接以考据学为主了。所以有人将吉田篁墩视为考据学的首倡者。吉田篁墩在清代的考据家中,特别尊重卢文(1718—1796)、余萧客(1729—1777)等,认为卢之《汲冢周书》,“考据该备,援证探讨,不遗余力”,而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纯乎汉唐之旧学”。<sup>3</sup>

虽然有此相似之处,但毕竟日本的考据学是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之后产生的,因此就有一明显的“时间差”。中山久四郎指出,中国流行的学术风气,往往在一百年乃至二百年之后才在日本流行。他举伊藤东涯的说法为例,指出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首倡者为明末的李攀龙、王世贞,比荻生徂徕早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而考据学在日本宽政时代(1789—1801)前后的广泛流行,其渊源就是清代考据学由顾炎武、毛奇龄(1623—1713)等人开其端,逐渐在乾嘉两朝形成风气,传及日本,经历了百余年。<sup>4</sup>换言之,虽然日本自有其考据的传统,但日本的考据学则是清代考据学影响之下的产物。日本考据学的主要人物大田锦城,对清代学者十分尊敬。他虽然在思想上也属于折衷派,但已经不像片山兼山那样,对清代儒学显出轻薄的态度了。大田锦城在清代学者中,最崇拜的有三人:纪昀(1724—1805)、赵翼(1727—1814)和袁枚(1716—1797)。他在其著作《九经谈》中,大量采用了清人的研究成果。中山久四郎写道,大田锦城的学问,能在当时日本儒者中首屈一指,是因为他能接触和利用当时从中国传来的著作,然后加以吸收加工,写成自己的著作。实际上,据中山久四郎的考察,大田锦城的学问,主要源自顾炎武的《日知录》、毛奇龄的《西河合集》、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和《瓠北全集》等清代名儒的著作。<sup>5</sup>

在大田锦城之后,对清代考据学同样热心的是狩谷望之(1775—1835)。据说狩谷望之

<sup>1</sup> 佐藤文の郎:《折衷学概括》,第675页。

<sup>2</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近世日本の儒学》,第710页。

<sup>3</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第713页。

<sup>4</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第729页。

<sup>5</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第718—719页。

“专奉汉唐注疏，不屑宋明理气，性最嗜古，古刻本、古写本、古器古物、乃至碑版法书之类，可备采录者，与夫珍书异典、金匱之秘、名山之藏，博物君子未经见者，广搜而多聚之，精择而详言之，其考尺度、注和名钞，考证精覆、发明极多”。<sup>1</sup> 这种博学的态度，直可与戴震相比仿。更值得一提的是，狩谷望之将自己的书房，题为“实事求是书屋”，表现出他的治学，与清代考据学一脉相承。因此在狩谷所处的文化时代(1804- 1818)，由于他对考据学的提倡，“一变元明人的无根空茫之学”。日本考据学，正从那时开始走向其盛期，即使前面有所谓“宽政异学禁”，也没有能改变。<sup>2</sup> 而在中国本土，考据学已经开始为人所批评，如方东树之《汉学商兑》便是一例。而提倡今文经的常州学派，自庄存与(1719- 1788)开始，经刘逢禄(1776- 1829)、宋翔凤(1779- 1860)，慢慢在19世纪初年形成势力。中日两国儒学发展的“时间差”表现十分明显。

## 二、考据史学与近代史学

中山久四郎在论述19世纪考据学时，引用了重野安绎的评论“本邦考据之学，宽政已降盛”，以狩谷望之为其领袖，其门人有冈本保孝(1797- 1878)，而冈本保孝的弟子是木村正辞(1827- 1913)，可谓代有传人。”<sup>3</sup> 其实，重野安绎(1827- 1910)本人也是一位考据家，以后才成为一名史家。1889年日本历史学会成立，他当选第一任会长，为日本史学走向近代化之重要人物。重野安绎对考据学的兴趣及其训练，自然为他推动日本史学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日本史学的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即是考据史学的近代转型(reincarnation)。

一般认为，日本史学的近代化，循两条相接但又不同的轨迹行进。一是“文明史学”、“民间史学”的产生与发达，二是从考据史学到“学院史学”的转化。<sup>4</sup> 这两条轨迹，代表了明治日本的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吸收西学，二是革新传统。它们的目的其实相同，因此双方有所互动。但就其取经来看，则又有明显的区别。“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 1901)。福泽谕吉在年轻的时候，既受过汉学的熏陶，更有“兰学”的训练，学习过荷兰语和英语。明治维新前后，他曾任幕府考察西方的翻译官，所著《西洋事情》一书于1866年出版，为日本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著作，在明治维新前后十分畅销。

1868年，福泽谕吉拒绝任职于刚成立的明治政府，而是一心投入教育，创立了庆应义塾大学。他的基本思想，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中，表达得十分明确，那就是希望开启“民智”，以求社会的进步。福泽谕吉对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特别偏好，认为是区分东、西文化的重要标志。在福泽看来，东方的儒家文化，注重的是精英人物的培养，但西方的社会，则注意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为了求得社会的进步，兴办教育就是一个手段。在为庆应

<sup>1</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第722页。

<sup>2</sup> Robert Backus, "The Kansei Prohibition of Heterodoxy and Its Effects on Educ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 1 (June 1979), pp. 55- 106.

<sup>3</sup> 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第723页。

<sup>4</sup>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氏著：《日本の近代史学》(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7)，第67页以降。

义塾选择教材的时候,福泽注意到两本最近出版的西方历史著作,一是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二是巴克爾(Henry Buckle, 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两本书在日本有多种译本,对于“civilization”一词的翻译,也有两种,即“文明”和“开化”,以致当时人便将“文明开化”并用,成为提倡西化的主要口号。<sup>1</sup>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不但有他对明治以后日本社会发展的构想,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那就是要用文明进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摆脱原来治乱兴亡的朝代史,走出道德训戒的治史模式。简略说来,福泽所提倡的史学模式,就是要用“人民的历史”取代“政府的历史”;用“被治者的历史”取代“治者的历史”,改变原来日本历史上的“权力偏重”的现象。他认为只有如此,方能改变日本文明“半开”的状况,向西方文明看齐。<sup>2</sup>因此,《文明论之概略》既是“文明史学”实践的指导思想,更指出了明治日本历史发展的方向。

就“文明史学”的实践而言,田口卯吉(1855-1905)是主要代表。他自1877年开始,发表《日本开化小史》,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付诸实施。《日本开化小史》的写作手法,一改原来朝代兴亡史、王室沿革史的面貌,用类似传统史家写作“艺文志”的写法,突出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但又包括日本历史的其它方面。田口采用了“社会”这一新名词,并且希图从历史研究中,展现社会发展进化的“一定之理”,即“社会所存之大理”。在田口看来,这一社会演化之“理”,与“货财”(经济)之进步,更有关系。但尽管他有如此想法,真要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探究社会演化之理,则不是那么容易。《日本开化小史》还带有政治史的痕迹。后田口又写作《支那开化小史》,更被人讥为“政纲小史”。<sup>3</sup>

不过,虽然“文明史学”的推广者,都是所谓“新闻史家”,并非专业学者,但“文明史学”的兴起,是日本史家批判道德史学,也即审查、检讨日本传统文化的开始。这一倾向的出现,指出了日本史学近代化的主向,也是“文明史学”与“考据史学”、“学院史学”的相交点。<sup>4</sup>

明治政府成立的第二年,下令为修史作准备。那时所设的修史机构,在原来保己一(1746-1821)的和学讲谈所内,建立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同年,明治政府设大学校,合并了昌平校、开成所和医学所。国史校正局便属大学校,改名国史编辑局。但以后又产生一些变动。1875年明治政府设修史局,两年以后又改名修史馆。修史馆所做的工作主要在四个方面:(1)由川田刚负责收集自南北朝以后的史料和皇室的系谱;(2)由重野安绎负责收集、编修德川时代的史料;(3)编修《复古记》和《明治史要》;(4)编修地方志。川田刚和重野安绎之间,就整理史料还是编修正史产生分歧。以后川田刚离开修史馆,于是重野安绎开始着手编修《大日本编年史》,其所用体裁循《左传》和《资治通鉴》,其目的是“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纲常”。

以上这些工作以史料考订为主,足见考据学的影响。的确,在19世纪日本儒学家中,考据家居多。在上面提到的狩谷望之以外,还有伴信友(1773-1846)和保己一,而后者

<sup>1</sup> 小泽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明治编》(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第104-122页。

<sup>2</sup>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第68-70页。

<sup>3</sup>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四卷,(明治二十年版,藏日本国会图书馆)。对田口的批评和田口的反驳见卷四。

<sup>4</sup> 大久保利谦:《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第95页以降。

和学讲谈所,更以培养考据人才闻名,重野安绎所推崇的木村正辞,就曾在和学讲谈所工作。修史机构设在和学讲谈所内,显然有意继承考据学的传统。因此修史馆注重整理史料并不见怪。现代日本史家家永三郎指出,明治时代的史家,忠实继承了伴信友、狩谷望之和保己一的“实证主义精神”。正是这一实证主义的作风,是连接德川时代考据史学和明治时代学院史学的桥梁。<sup>1</sup>

可见,日本史学的近代化与欧美各国几乎同时发生。如用历史专业刊物的发行而言,德国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发行最早,于1859年出版。法国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发行于1876年,《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发行于1886年。而《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则迟至1895年才正式发行。日本的《历史杂志》在1889年出版,还早于美国的同类刊物。<sup>2</sup>但是就专业化的特点而言,日本史学的近代化,则与考据学的传统关系甚大。

这一考据学和学院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其思想史上的内在原因。如前所述,重野安绎等人所继承的,是自德川时代中期以降,日渐发达的儒家考据学,其思想倾向虽然以折衷著称,但其实质则是想超越汉学、宋学之分,也即突破朱子学的藩篱。由是,日本的考据学是对朱子学的一种“反动”。在史学的领域,朱子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德川时代开始编写的《大日本史》一书,其指导思想是劝善惩恶,由德川光(1628-1700)主持,其编辑者大都是朱舜水的弟子。虽然朱舜水的理学思想,已经对程朱理学所改变,但他在日本的影响,还主要属于朱子学一系。《大日本史》因此是道德史学的主要代表。从“宽政异学禁”的角度来看,考据学是朱子学的对立面,因为当时所禁的,也包括了考据学。”

但到了明治时代,考据学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借助德国的兰克学派,其声势更为壮大。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对传统的道德史学,开始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击。重野安绎指出,劝善惩恶的史学必然会歪曲历史事实,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重建过去的事实而已。久米邦武也写道,历史研究必须“一洗劝(善)惩(恶)的旧习”。<sup>3</sup>他们对道德史学、或“劝惩史学”的批判,既可视作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一种实践,是对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一种摒弃。但同时,这种批评也是德川时代朱子学与考据学相互对立的一种继续。<sup>4</sup>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等人采用考据学的手段,以道德史学为主要批评对象,对日本以往的史料和史实,做了详细、无情的考订、批判。他们严厉审查史书、史实,揭露了过去记载中的一些不实之处,使一些保守人士感到不满,如重野安绎就被讥为“抹煞博士”。譬如重野安绎和星野恒分别撰文,对脍炙人口的历史人物儿岛高德提出疑问,认为以前人们过于相信《太平记》这样的文学类作品,证据显得不足。而星野恒甚至推测说,《太平记》的作者小岛法师,其名字的训读与儿岛相似,或许两人是同一人而已。而久米邦武则以《神道乃祭天的古俗》知名。他在文中探究神道教的历史渊源,使人感到他在否定神道教的宗教性和神圣性,因此遭到许

<sup>1</sup>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第81页以降。

<sup>2</sup> 三上参次:《本邦史学史论丛》序,上卷,第1-4页。

<sup>3</sup> 参见Robert Backus,“The Kansei Prohibition of Heterodoxy and Its Effects on Education”, pp. 55-106.

<sup>4</sup>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第83-85页。

<sup>5</sup> 大久保利谦:《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第74-86页。

多攻击,最后久米邦武只能离开东京国大学。<sup>1</sup>

总之,日本儒学中的考据学传统,为日本学者接受西方的实证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准备,促成了日本学术的近代转型。日本史学的近代化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主要因为考据学这一传统,在19世纪中期日本向西方开放的时候,仍然方兴未艾,源远流长,为日本学者选择、吸收西方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立场。换言之,西方文化并不是划一的整体,而是多重多元。就历史思想而言,兰克所代表的批判史学只是其中一种。日本虽然首先吸取的是巴克尔、基佐的“文明史学”,但很快又热衷兰克史学,并使其移花接木,让它与本土的考据学传统“并合”,正是其史学近代化较早成功的关键。<sup>2</sup>这里,传统与近代,形成一种貌似偶然、却又自然的历史结合。山路爱山(1864-1917)写道,与西方史学相比,幕府时代的史家有所不及。“以致于在维新以来,西方文化如决堤之潮,弥漫日本思想界。但日本史学并没有被扫在一边,而是善于维持其命脉,咀嚼消化输入的新史学,以致获得建立今日规模宏大的东洋史学之盛运。”<sup>3</sup>显然,这一“盛运”的基础,来自考据学的传统。

### 三、“整理国故”与民族主义史学

与日本相比,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更早,但却命运多舛,几经曲折。其中原因自有多样,不应简化。但从史学近代化的角度观察,则可发见,中国近代史学与清代考据学,形成有一种比在日本更为复杂、曲折的关系。这一复杂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形成和普及,因为历史写作通常是推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武器。而民族主义观念的兴盛与否,又与民族国家的建设息息相关,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生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又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多有关联。

如前所述,考据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作为一学术潮流,则在明清转型之际慢慢形成气候,而在乾隆、嘉庆年间蔚为一时风气。那时的儒学家大都以考据见长,即使像戴震这样有意阐发“义理”的学者,还主要以其考据学的功夫知名。18世纪后半叶的章学诚(1738-1801)曾对考据学的风气,表示某种不满,但却孤掌难鸣,无人响应,而他本人著述虽多,一生则穷苦潦倒。<sup>4</sup>不过,进入19世纪之后,对考据学的批评则渐成声势。常州学派力倡今文经,得到朝廷的辅助,而桐城派则虽以博采汉宋为标榜,但却以程朱为宗。这些变化,都促使和标志了考据学的衰落。<sup>5</sup>19世纪上半叶的龚自珍(1792-1841),为考据家段玉裁(1735-1815)之外甥,自幼受到考据学的熏陶,但以后却以今文经知名。与他同时的魏源(1794-1857),也同样为今文经家。桐城派的主要传人,则是晚清赫赫有名的曾国藩(1811-

<sup>1</sup> John S. Brownlee, *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 1600 - 1945*,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8, p. 92.

<sup>2</sup> 佐藤正幸:《历史认识的时空》(东京:知泉书馆,2004),第343页。

<sup>3</sup> 今井登志喜:《西洋史学の本邦史学にとへたる影响》,第1453页。

<sup>4</sup>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

<sup>5</sup> 参见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 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872)。总之,与日本相比,考据学在 19 世纪的中国已经日薄西山,其代表人物惟有俞樾(1821-1901)及其弟子。

19 世纪的中国,已经明显感到西方列强的存在和威胁。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家,对此十分注意,因此提倡变法。他们的治学,由此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曾国藩以拯救孔孟之道为志,起兵抗击太平军,进而促成“同治中兴”。与之相比,俞樾的治学则似乎与世无关。像乾嘉时代的钱大昕、王鸣盛一样,俞樾虽有功名,但却志在学问,弃官为学,主持苏州、杭州等地书院几十年。由此可见,在当时东西方交流、冲突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物,主要都来自考据学的对立面。从历史观念的角度看,龚自珍、魏源等人,已经接触到西方的进步史观。他们用今文经的“三世说”加以附会,以此来强调变法之必要。而康有为(1858-1927)更为大胆,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但攻击古文经的立场,而且改造孔子的形象,为维新变法张目。因此,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其学术氛围与日本正好相反。俞樾的弟子章太炎(1869-1936),曾对古文经充满兴趣,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却一度采取了今文经的立场。

晚清学术氛围的特点,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更影响了中国史学、学术的近代化。像日本的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一样,晚清学者对西方的进步、变化的历史观念,充满了兴趣,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都不例外。他们对历史进步观念也即进化论的引进,手段有所不同,但目标一致,不遗余力。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加剧,严复(1853-1921)适时地翻译出了《天演论》,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东渡日本,很快为日本的“文明史学”所吸引,在中国提倡“史界革命”,号召写作“新史学”。他的目的与福泽谕吉相同,就是要扩大史家的视野,从写“君史”到“民史”,从朝廷转到国家,倡导民族主义史学,为建立民族—国家服务。<sup>1</sup>

由于中国的“史界革命”,主要由史学界以外的人士发动,其弊有二。首先是声势不大,影响有限。梁启超的《新史学》,连载于《新民丛报》。与他想法相似的邓实(1877-1951)、黄节(1873-1935)等人的文章,见于他们所办的《国粹学报》。他们的观念和想法颇为先进,但因为不是专业史家,无法系统实施。其次,由于缺乏实践,“新史学”的想法无法真正贯彻。具体说来,要想实施“新”史学,就必须摒弃“旧”史学。日本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其工作被人称为“抹煞论”,正因为他们用考据学的手段,对以往的道德史学,做了无情的清算。但中国在整个 19 世纪,都没有对以往的思想文化做彻底的整理、清算工作。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学的专业化,没有像日本那样,在 19 世纪后半叶便出现,也就情有可原了。在中国,历史专业学会的建立和历史专业刊物的发行,都要到 1920 年后才冒头,比日本要晚三十年以上。<sup>2</sup> 不过,自 1910 年末开始,也即在胡适回国之后,中国史学界也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其标志就是“疑古”思潮的兴起。显然,这一“疑古”思潮所扮演的角色,正与明治日本的“抹煞论”相同,即要清算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要“整理国

<sup>1</sup> 详见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与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第 32 期(2003 年 12 月)。

<sup>2</sup> 参见张越、叶健:《近代学术期刊的出现与史学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故、再造文明”。胡适虽然主治哲学,但他的治学方法却以史学为宗。这里的原因,与他留学美国时,美国的学术氛围有关。那时美国人文学科均受德国历史学派,也即兰克学派的影响,注重文献的考订、事实的确证。这一风气,虽然受到提倡“新人文主义”的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1865– 1933) 批评,但仍盛行不衰。<sup>1</sup> 胡适对考据学早有兴趣,不过他有意地沟通考据学与西方学术,则在他留学美国之后,以他的博士论文为标志。他在论文的序言中指出,像西方学术一样,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对方法论的探求,也经久不衰,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开始,到乾嘉的考据学,源远流长。胡适回国之后,更致力于汇通中西学术。他一方面宣传西方的科学主义,包括邀请他的老师杜威 (John Dewey, 1859– 1952) 来华作学术演讲,另一方面则极力重振乾嘉考据学,强调乾嘉诸老的治学具有科学的精神。胡适对考据学性质的认识和改造,正如日本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

因此胡适在中国史学、学术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之成就,既与他的学术兴趣有关,更于他的求学背景相连。胡适回国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正经历重要的改革。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以学术中立、兼容并包为追求目标,其实就是提倡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推广新的治学理念。这些都为胡适的出场做好了准备。由于胡适并非史学出身,因此中国史学的专业化,尚需待更多的时日。但胡适提倡“国学研究”,以“整理国故”为口号,以“再造文明”为目的,不但提醒了新旧时代之差别,而且还主张从新的、现在的立场出发,审视、研究、批判过去的传统。<sup>2</sup> 在他的激励下,顾颉刚 (1893– 1980) 大胆疑古,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大刀阔斧地展开批判。这一“疑古运动”已有多人研究,此不赘言。它的效用,正如上面所言,可与明治日本学院派史学家开展的“抹煞论”相比拟。

但是,虽然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中国学术开始全面近代化,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与考据学相连的实证主义治学风格,在中国学术界流行并不很久。19世纪20年代是其盛期,先有顾颉刚开展的“古史辩”讨论,后由傅斯年 (1896– 1950) 领导的殷墟考古发掘。前者怀疑中国的远古时代,后者用科学手段论证其存在与成就。两者虽然不同,但却异曲同工,为近代中国人重建了一个“科学的过去”,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想象。于是,民族主义的史学便在近代中国植根了。”

(作者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姜 )

(责任校对:刘 军)

<sup>1</sup> 详见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7期。

<sup>2</sup>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史学系,1999)。

» 参见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 SUMMARY OF ARTICLES

## **The Global History in National Historical Memories// *Yu Pei***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alls for a global history. But as there is no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re is no general global history either.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 has made different global historie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do not cut off the persistence of every national historical memory. Every independent nation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historical memory,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cognizance and opinion of its own nation, but also that of other nations and the entire world—global history.

## **The State School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Cao Weian***

The State School had clinking influence among multitudinous Russian historical schools in the period from mid-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following topics: the form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e School, the main issues that the State School dealt with, the State School's idea of history, and Russian historical academia's collective opinions on the State School in different periods.

## **Euro-Centr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Ren Dongbo***

There are premised, culture diffused, and anti-Eurocentric Euro-centr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There are also three forms of Eurocentric critics: supersessionism, intermediationism and revisionism. Criticizing Euro-centrism can not only construct the theoretic presupposition and practical route of "Chinese School", but also help create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Chinese School". The route to "Chinese School" should refuse any sense of universalism, cultivate a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nd combine native academic resource with the west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make a media of dialogue and controversy, only in this way we could establish our ow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set up a relative equitable platform among the world, and accomplish our cultural de-colonization mission.

## **The Rise and Fall of "Evidential Learning" and Its Impacts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 *Q. Edward Wang***

By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evidential learning was under severe attacks in China, whereas it received ample attention in Tokugawa Jap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began its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hich was on the one hand inspired by the writing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by Henry Buckle and François Guizot, on the other

hand, motivated by the evidential interest in source criticism. The latter led Japanese historians to discover and embrace Rankean historiography. By contrast, influenced by the New Text Confucian school, which rose to the fore after the decline of evidential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Chinese thinkers, such as Kang Youwei, Zhang Taiyan and Liang Qichao, took a great interest in evolutionism. It was not until the 1920s that Hu Shi and others began to revive evidential learning, which helped the Chinese also to receive Rankean historiography. All this show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evidential learning have notably influenced the traject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he two countries.

### **A Review of Becker's Relativist Historiography// *Wu Daoru***

Carl Becker was a famous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historical thoughts embodied three points: pragmatism, subjectivism, presentism. Although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in introducing and studying Becker's work, some questions that studied before could be reconsidered under some new circumstances. This thesis states that analyzing Becker's relativist historiograph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s aim that was criticizing the scientific history, otherwise, we might misunderstand Becker.

### **The Defensive Tactics and the Earl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Theory of Defensive Modernization// *Xing Laishun***

The earl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had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was not in step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ehi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view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was that the ruling class took the "defensive" tactics and used attack as a means of defense in the capitalist social transition, in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ensure its own interests.

### **The Hopeless Conflict Structure: The Third Comments on Qing Empire in the World History// *He Fangchuan***

When western colonialist powers expanded eastwards, they found a declined Ming dynasty and a rising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establishment and heyday of Qing Empire, her national vitality was so much rigorous that no western power, no matter Portugal, Spain, Holland and Britain could resist her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m, however, the western powers have been prosperous in turn,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various factions such as the law of natural economy in Chinese dynasties, the destiny of Chinese maritime merchants under the oppress of Chinese monarchy, Qing empire exhausted her national vitality and declined eventually.